
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作为的若干考虑

戴星翼¹

（复旦大学 环境与工程系 200433）

【摘要】：上海是全国唯一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中心，拥有其他城市难以企及的有利条件。本文介绍了纽约、伦敦金融业的发展现状及其对上海的启示，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终极发展目标是能够向全球提供月艮务，将辐射力覆盖全世界。而短期目标则需要更多地致力于如何更好地为长三角地区、长江经济带和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服务。

【关键词】：国际金融中心 长三角地区 国家战略 上海

上海致力于打造卓越的全球城市，其目标是功能性的，是因为中国作为全球经济规模第二的庞大经济体，需要一个能够影响全球资源配置格局的中心。从全国看，没有第二座城市能够替代上海的角色。全球城市的核心要素是国际金融中心。

北京从金融业的规模看，许多方面与上海不相上下，这是因为北京乃是大型金融国企总部所在。而深圳虽然一些方面更为优秀，但其金融规模较小，就金融市场的交易规模而言，全国所有大城市的总和尚不及上海。因此，上海最适合成为全国唯一的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中心。

未来上海如何更进一步，直至其资源配置能级提升到与伦敦和纽约类似的水平？其动力会来自中国的进一步强盛，国家的发展会带动上海城市地位的不断上升。

但更主要的是，上海在推动国家的强盛方面如何有所作为，如何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如何在国家战略中担当起资源配置中心的责任。回答好这些问题，上海前进的动力才会更为强大。

作为顶级的资源配置中心，需要拥有各类强大的要素市场，从而能够有效地为广大地区内的政府和企业服务，能够有效降低其服务对象的发展成本、运行成本或商务成本。

说到底，上海的要素市场就是要为其服务的地区政府和企业找市场、找资金、找技术。这里所谓的“广大地区”没有边界，如纽约和伦敦有能力向全世界提供服务，辐射力覆盖全球，上海的终极目标也在于此。但其较为短期的目标，需要更多地致力于如何更好地为长三角、长江经济带和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服务。

一、纽约和伦敦金融轴心的启示

¹作者简介：戴星翼，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纽约与伦敦金融的关联度

纵观历史，纽约-伦敦轴的发展一直由强劲的共性和互补性支撑。这两个城市有共同的语言、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的优良传统、商业和金融的自我监管信仰的沃土，以及面向股东而不是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和会计标准。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实践基地，纽约和伦敦形成了英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金融轴心。它们的政治、文化和商业精英互动密切，促进了融合两者的生活方式，因而出现了术语 NY-LON。新闻周刊的文章指出：NY-LON, 与单独的纽约或伦敦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工作、娱乐在这两个城市，好像它们已经合二为一。

纽约和伦敦之间的共性让金融企业 and 专业人士几乎在两个中心之间无缝移动，降低相互作用的成本，同时两个城市的互补性创造机会，使互动变得有利可图。

纽约控制着全世界最大和最具流动性的国内金融市场的入口，伦敦的地理位置、政治和历史地理特征则意味着能进入欧洲市场和全球网络（例如印度、香港和澳大利亚）。

举例而言，在伦敦，美国的银行可以雇佣讲法语和德语的专家，利用英国庞大的流动的国内市场和金融工程人才的智库。而纽约引领全球金融创新，主要的对冲基金、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都来自美国，全球证券交易市场的大多数新产品和交易方法出自纽约。

伦敦的金融公司（由美国的银行领衔）在本地适应美国的金融创新，使这些创新从美国传递到国际市场。许多来自美国零售银行业务的创新，包括数据处理中心和电话银行，正是通过伦敦传播到欧洲其它地方的。

伦敦和纽约之间的连接同样需要物理的基础设施。世界上几乎没有其它城市有如此密集的网络光纤线路以及定期航班支持信息传递。正是两大金融中心的共性和互补性的融合推动纽约和伦敦在全球城市和金融体系中作为顶级中心而共同演化。

（二）对上海的启示

纽约、伦敦以及两者的关系可以带给上海很多启示。

一是规则体系的完善和严格。虽然美国也曾出现雷曼兄弟事件乃至次贷危机，但值得关注的是，即便是这些问题的处理过程，也反映出了其规则体系的有效性。

以股市为例，经过 2008 年的金融风暴，制度完善且上市公司整体质量较高的纽约股市早已超过了先前的高点，根本原因在于注重保护股民的权益。

二是注重创新。因为持续不断的创新，纽约与伦敦的金融服务水平明显领先于世界。由于这些创新为世界所效仿，纽约和伦敦也就能够保持规则制定者的地位。

三是高度的融合。这不仅意味着纽约与伦敦的融合，还意味着它们对全世界的开放和渗透。

与纽约和伦敦相比，上海在以上三方面都有不容忽视的重大差距，每个方面都决定着上海全球金融中心的成就。尤其要指出的是，规则建设与创新之间存在着既相辅相成而又矛盾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其结局就是不停地折腾。

在融合和开放方面，上海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仅要对外开放，也要对内开放。由经济增长体制决定，我国地区之间的种种壁垒并不亚于许多国家之间，并因此严重制约着上海金融中心的作用。

全球城市的核心要素其实是国际金融中心。其他如文化、商贸和科技创新等虽然重要，但并非基石。所以，上海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当以金融中心为首要目标，通过坚持不懈的制度建设、服务创新和开放融合，提升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目前，上海已经拥有了许多其他城市难以企及的有利条件。与纽约相似，上海成为中国这一行将不亚于美国的大经济体的门户入口，以及这个大经济体最为重要的金融中心。

与美国东北部是纽约的腹地类似，长三角乃至长江经济带是上海的经济腹地。在时机上，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上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所以，天时地利具备，就看上海如何做好自己。

二、积极开展“两个”服务

受我国经济增长的“诸侯经济”体制制约，上海的金融中心建设很大程度上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耕耘。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国际金融中心发挥作用的重大困境，也是上海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创新而致力于突破的主要方向。

今后的很长时间内，金融中心建设必须更好地与国家战略实行良性互动，以金融中心功能的增强支持国家战略的实施，以国家战略的实施增强金融中心的功能。

（一）服务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金融中心应该作为“一带一路”的引擎，起引导资源配置、优化投资效果的重要作用，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基础性支撑。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积极围绕该战略施展拳脚。

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优先领域，也是贸易、货币互通互联的基础。但目前不论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财力，还是以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为代表的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以及以亚投行为代表的新成立的配套金融机构，都难以满足“一带一路”这一经济长廊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巨大融资规模。

上海作为金融中心，应致力于提升其跨境金融服务能力，可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更为宽松与开放的境外金融服务政策，一方面，通过商业银行更为完善的跨境金融服务为中国制造等国内实业走向世界提供有效支撑；另一方面，让“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实体经济与中国资本市场直接对接，吸引这些国家的重点企业通过中国资本市场融资发展。

“一带一路”是个广阔的市场，需要多层次、多元化的融资方案进行对接，需要金融机构设计综合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跟随，也需要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同业、境外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如商业银行可以和政策性银行、丝路基金、亚投行多方合作。

上海不仅具备上述各类机构聚集的得天独厚条件，更可凭借自贸试验区金融实践地的优势，提供多方金融机构合作的平台，形成金融机构与“一带一路”项目对接的自选菜单式的跨境金融热点服务区。

当前的“一带一路”实践，有过于偏重基础设施和资本输出的倾向。其实，中国与相关国家间存在着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以巴黎气候大会达成的决议为例，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上存在着深刻分歧。

发展中国家认为，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所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应由发达国家负主要责任，原因是工业革命以来这些国

家的排放导致了温室气体的累积。

因此，阻止全球进一步升温虽然要求所有国家共同努力，但为了降低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成本，发达国家应该向其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应该承认这些要求的合理性。穷国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实现碳减排，唯一的道路就是更多地使用清洁能源。

但能源升级需要大量投资，同时，更为清洁的能源通常也价格更高。如果其成本由这些国家单独承担，其实就是在环境正义的名义下，要求穷人支付更高的能源价格。显然这并不公平。

所以，即便是发达国家，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也是认可的，在原则上也并不反对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但在实践中，相关援助只能说是口惠而实不至。与庞大的能源升级成本相比，资金援助的力度是杯水车薪。

至于技术援助，则因为相关技术资源归私人企业所有，政府无能为力。在现实中，我们还有理由相信发达国家的私心：如果发展中国家在碳减排和新能源发展上不得不购买这些公司的技术或产品，发达国家岂非还能够从中获利？当前这一矛盾依然存在。

更确切地说，只要国家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以及发展与保护之间、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之间存在冲突，此类矛盾也就会持续存在。而中国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动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

中国虽然还是发展中国家，但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人均 GDP 已近 8000 美元。结合其庞大的人口规模，总体经济实力已稳居全球第二，而且资本充沛。与此同时，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也已超越了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尤其是拥有大量适用技术。

自“十一五”以来，中国全方位致力于节能减排，无论建筑还是工业设备的节能改造，都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产生了极为丰富的单项技术和集成技术。其中还包括大量由政府资助的公益性技术。

中国的节能服务业已经初步长成。选择融资能力和技术能力都比较强的合同能源管理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不仅能够帮助这些国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经济上实现双赢，也能够推动我国相关服务业的进一步壮大。

在新能源发展领域，中国也已经实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技术进步。上海的百万千瓦超临界发电机组发电效率和排放皆位居世界最先进水平，实现了煤炭的清洁化利用。

我国的风光互补发电技术能够让草原、深山和海岛的群众享受到电力和电视，能够成为小型海水淡化装置的动力系统。所有这些，都是生活在沙漠、山区、草原和海岛的人们所需要的。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援助相比，这些技术显然更为实惠，更贴近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需求。尤其在“一带一路”相关区域的国家，有大量缺乏电力和合格饮用水的偏远地区，正是这些技术大有作为的发展空间。对这些国家的帮助，不仅有利于全球碳减排，更有利于巩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这就意味着，上海金融中心、科技中心和装备制造中心可以帮助“一带一路”中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新能源、开展能源升级和节能减排、改善其偏远地区和缺水小岛人民的能源条件和饮水条件，并为此开展研发的南南合作，提供相应的项目融资等。仅这一领域，就足以为上海提供极为广阔的施展空间。

对于上海而言，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依据以此产生的需求不断充实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深化其对广大“一带一路”国家的影响，对继续提升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可能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为此，上海可以根据“一带一路”国家的需求，建设相关的平台。例如，未来证券市场的国际版可以吸引这些国家的企业来上海上市，也可以鼓励我国企业与“一带一路”国家合资，并在上海证券市场上市。

（二）服务于长江经济带建设发展

长江经济带地域广大，是中国城市类型最丰富、辐射空间最广阔的区域，既是国内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撑，也是“一带一路”的支撑。长江黄金水道横贯东西，构成低成本的物流大通道，支撑着流域一百多座城市的运行。

长江经济带的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黔中、滇中五大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存在差异，需通过更为密切的产业互动、基础设施连接、要素流动和市场开放，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作互动的格局。在理顺、盘活长江经济带这盘棋上，上海应借助金融中心的优势，发挥龙头城市作用。

长江经济带概念的提出，无非是要实现流域所有地区产业的整合，推动地区间经济发展的错位、互补和一体化，实现更为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同时整体上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就现状而言，这种一体化进程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表现在长江物流运输的整合和人员信息交流的便利化。

但总的来说，我国特有的“诸侯经济”是一体化进程的最大障碍。地区之间凡事要协调，要计较，更多的是相互竞争。这种竞争并非市场竞争，而是地方政府使用其管制权力和对土地等资源的垄断地位开展的竞争。所以地方主义、保护落后、产业同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诸多顽疾可以说挥之不去。

过去一些年的经历表明，这些问题通过中央的调控难以见效。典型案例就是对钢的过剩产能的调控，结果是1.年调控，将钢产量从2.5亿吨调控到了8.3亿吨。因此，需要有更有效的途径来整合长江流域的经济。

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整合上，应充分发挥上海金融中心的作用，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笔者认为，在以下方向上，上海可以施展金融中心的重大作用。

其一，上海可帮助流域各省市建设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应当注意到，虽然与伦敦、纽约、新加坡或香港这样的城市相比，上海的金融业还有明显的差距，但与我国腹地城市相比，无论在产业的完整性、经验和人才的集聚程度上都有很大的优势。

帮助各省市完善其经济中心的金融功能，不仅有利于这些省市发展方式的转型，也以此加强流域金融业一体化的程度，实质性地强化上海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讲的金融业，不仅指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之类的核心行业，也应包括财务、会计、租赁、管理和咨询等更为广义的，与金融关联的产业。帮助的方式，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实施。为此上海需要培育扶持相关企业，并鼓励这些企业进入流域其他城市开设分公司，或与当地企业合资合股。

其二，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发展方式转型，并从整体上处理好流域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上海需要全方位地通过金融业整合和优化城市、省市和全流域的产业结构。为此，上海可以为之的空间很大。

例如，为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上海的资本市场应对那些注重技术进步、工艺改造和品牌战略的企业倾斜，致力于培育高端生产服务业。与此同时，上海应该成为中国优秀风投基金的大本营，以促进国内尤其是长江经济带的科技创新活动。

其三，为长江经济带去产能任务发挥积极作用。长江经济带面临着艰难的重化去产能任务。长江流域以不足全国29%的人口，

却拥有全国约 48%的重化产业，中下游沿江密布着重化工企业、火电和港口，加上上游层层叠叠的水电行业，流域的生态、环境和安全已经面临全面威胁。

更值得注意的是，重化过度 and 能耗过甚并非发展之必须，而是流域各省市自身利益所致。依靠大建设和大项目拉动 GDP，成为流域许多省市的统一模板。在此大势下，出现了全国性的严重的产能过剩，长江流域更是面临着强大的生态环境压力。

但去产能又是困难的。地方税基受损、给予企业补偿、债务清偿、员工安置等一系列难题足以使地方政府望之生畏。同时，地方政府整体地陷入“囚徒困境”，希望其他地区去产能，而自己能够因此受益。

当前对于去产能，各大银行只是简单地限制贷款，其思路依然过于行政化。上海应该鼓励以金融为核心的高端生产服务业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流域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去，其对策应该更为个性化。去产能也好，产业升级也好，其实都有着诸多可能，金融业的参与也有诸多路径。由此也要求上海的金融业敢于和善于创新。

三、加快整合长三角产业体系

从现有的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看来，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城镇集聚程度最高的城市化地区。其核心地区是南京、上海、杭州这一三角地区的 14 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上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一些县级市的人均 GDP 甚至已经达到三万美元以上，与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相若。

从人口和经济规模看，说长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也不为过。但在功能上，长三角地区还远远谈不上强大。最大的问题是诸城市之间未形成有机的分工，反而以相同的模式发展经济，导致产业同构，以及严重的低水平互相竞争。

这种状况近年来有所改善，着重表现在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大建设后发生的同城化趋势。但总的来说，现有体制导致的城市功能雷同和碎片化现状没有根本性改观。

笔者认为，长三角的整合关键在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城市，其基本的定位应该是为城市群的几十座城市服务，将强大的服务流辐射于整个区域。通过与上海的互动，各城市逐步优化自身的定位与产业结构。上海的金融服务业于此大有可为。

上海应借助自贸试验区优势，建立并整合国际版的金融要素市场。上海已在自贸试验区注册成立了上海国际黄金交易中心、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海清算所、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和上海保险交易所等，还积极筹划在自贸试验区内新设或增设面向国际的金融服务平台，制定与国际接轨的交易规则体系。

让境内外投资者在自贸试验区自由开展以人民币计价的各种产品投资交易，不仅可以增强上海的资本整合能力，也可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加快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加速金融改革。

以上各类国际版的金融要素市场的建立，可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通过上海向全球配置，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辐射能力，让长三角地区雄厚的民间资本有更大的施展空间。

长三角地区有无数的工业企业，其中不乏注重产品质量和品牌的，并在制造加工上有一技之长的中小企业。由发达国家的经验可知，高质量的中小企业是一国制造业的基石，甚至也是国力的基石。当前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严重，同时，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过高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为改善这些高质量制造业的生存环境，上海证券市场应针对这些企业进一步开放，甚至建设专业市场。需注意的是，这里

讲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二板市场，也不宜过度强调高成长性，而是优质的制造业中小企业。改善这些企业的生存环境，并推动长三角地区整个制造业的升级、分化和转型。

为促进科技创新，目前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已经建立了“科技创新板”。其性质是面向科技型、创新型中小微企业的专业化市场。北京和武汉等地也建立了类似的市场。但需要注意，科技创新板不能做成地方化的市场，其涵盖的地域范围着重应放在长三角地区。

当前长三角地区的科创活动遍地开花，虽然其效率可以质疑，但如此广泛的科创实践，必然会出现一些好的技术成果、项目和新兴企业。上海科技创新板需要与投资界，尤其是风险基金、投资咨询等行业保持密切关系，与长三角各地方政府合作，形成对科创微型企业的发掘、扶持、辅导、上市机制。